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的特点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 曹金举

[摘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沉闷的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崭新的革命。它批判落后的封建主义，斗争反动的资产阶级，彻底地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特权，给千万彷徨中思索国家出路的先进的中国人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条能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民主的光明之路。一扫辛亥革命的失败带给中国社会的沉厚阴霾。

[关键词] 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特点

19世纪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1899年2月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登载的一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国第一篇提及马克思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已引起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注意。

此后的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众报》第18期发表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其中有麦喀士日尔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的记载，此后在《新民众报》多次写文章谈社会主义，并提到马克思，但对马克思学说，内容都未提及。1903年2月15日《译书汇编》刊登马君武的文章《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将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研究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1]。此时的马君武崇尚进化论，自然还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成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2]但孙中山的言论是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在中国发生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的吸取。

大量事实证明十九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一些思想已经传入中国。但由于传播者的阶级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传播者所形成的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往往是片面而支离破碎的，众多人的集合也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系统而又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观点，没有能力引起大量知识分子对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注意。更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些对马克思的介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任用。

一、传播初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

辛亥革命的爆发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推翻了没落的清王朝，共和观念的传播在思想上给落后的封建文化思想以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以为从此中国将走上强国之路。然而，由于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强大。非一次不彻底的辛亥革命所能完全的打败，封建的阴霾仍然笼罩着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失望之际，开始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要想真正的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必须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对腐朽的封建文化以致命打击才能唤醒国民的民主共和之魂。

在这种背景下，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为捍卫和巩固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发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没能从根本上破除落后的封建思想。从而束缚阻碍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因此提出“科学”、“民主”、“个性主义”三个响亮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斗士们发动的这场对国民思想以启蒙的文化运动，极大增强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使资产阶级文化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不过由于他们错误地把封建道德归结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看不到封建道德存在的社会基础，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经济制度，当然也不能对封建主义思想体

系作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这种对旧的封建主义的无情批判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清道夫的作用。

1917年依然苦闷的中国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迎来“北方的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沉闷的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崭新的革命。它批判落后的封建主义,斗争反动的资产阶级,彻底地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特权,给千万彷徨中思索国家出路的先进的中国人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条能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民主的光明之路。一扫辛亥革命的失败带给中国社会的沉厚阴霾。十月革命燃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火焰。中国最早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对俄国革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和向往,他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中指出了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的出路,他认为革命潮流势不可当,认为革命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然而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起了众多的地主阶级和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的恐惧。中国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一方面咒骂马克思主义的可恶,另一方面纠集徒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攻击。

1、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曾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的胡适首先站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抨击,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攻击说,空谈“主义”是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针对胡适的攻击。李大钊同年8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的攻击以有力的反击,在文中他认为只有社会上多数人有了共同的理想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样才能对社会问题有一个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今天来看这段论战,胡适的观点虽失偏颇,可也有些许可取之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初期,他大力鼓吹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的理论,应给予猛烈的抨击。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至1921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同研究系分子梁启超,张东荪展开斗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借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罗素来华之际,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讲演后,发表了《从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等文章。梁启超也发表了《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一文,论述了他们借“社会主义”招牌,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者,国家又很贫困,所以无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达、李大钊等人纷纷发表文章,驳斥了这些错误观点。

针对研究系分子认为中国无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只能以资本主义实业救国的论调。陈独秀反驳说,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难道不是劳动者做出来的?先生办的报,不也是劳动者排印出来的?针对研究系分子认为只能走资本主义实业救国的言论。李达指出:“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3]又说:“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实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度产业社会生产所生之一切恶果”[4]

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梁启超、张东荪的歪曲社会主义的主张,批判了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宣传了社会革命的思想,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推向深入。

3、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

在同研究系分子斗争的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还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较长时期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打共产主义招牌的小资产阶级思潮。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这种思潮要求废除国家,主张一切自由,反对任何约束。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鼓吹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集中和领导。第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

级专政。第三,反对按劳分配,主张立即实现按需分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拥护者陈独秀,李达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的错误观点,他们指出,在一个群居的社会中,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若是固执个人和小团体主义,自由进出。这种社会终是一盘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取消国家的主论,指出:“我们底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拿国家来废除一切阶级的”。[5]对于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平均,要求立刻实行按需分配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也给予了批评。他们认为,按需分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才有可能实现的,中国的现在生产力依然落后,没有条件实行按需分配。如果强要在生产力落后状况下实行按需分配,只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倒退。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中有广泛的基础和市场,因此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战斗。但传播初期的这次交锋中,马克思主义打击了其嚣张的气焰。向广大人民揭露了其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初期所经历的三次战斗中表现出了淋漓尽致的斗争性。由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骨干而转换角色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秉承了反击封建思想的大无畏而敢于破除一切的革命精神。对一切阻碍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潮给予有力有理有据的驳斥。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一种先进的思想、主义要想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其必须是具有斗争性的理论,才能打败落后的反动思潮的围攻堵截。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革命性,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他与先进的而寻求救国的本身就具有斗争性的知识分子结合时,必然爆发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落后而反动的思潮都不能阻挡的,也必然能冲破阴鸷笼罩的中国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光明和富强民主的希望。

二、传播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传播途经的辐射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宣传给中国以前所未有革命新思想的冲击。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终于在1919年以反对巴黎停战条约的签订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导火索,五四运动爆发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投入到爱国运动中,成为五四运动初期的主力。由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革命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与五四运动相结合。5月20后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开始加入五四运动中,五四运动也由最初的单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只有同中国的工人阶级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能有希望成功。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相结合传播发展的特征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过程的始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传播中心由北京上海扩展到一些工业发达,工人阶级人数相对多的重点城市。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城市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传播之路。

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以列宁为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等来到中国,维金斯基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

上海党组织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党组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主要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上海共产党成立后,力约各地发展组织,帮助和推动了其他地区党组织的建设。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主要成员先后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张太雷等。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成立党

组织。1920年秋,长沙共产党组织建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殷柏、易礼容等。1920年12月,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1921年1月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最早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等。共产党组织的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这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首先是因为大城市工业发达,有相当多的工人阶级存在,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后盾。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时大城市先进的知识分子众多,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会投身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成为党的领导力量的后备军。而大城市资讯经济的发达也是党成立初期能迅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这种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并将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重心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苏俄革命的影响。1920年维金斯基在同陈独秀会见时提出建立共产党的建议。大意谓:依据苏俄革命的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乃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6]在党成立初期的革命运动中,以大城市为中心更能引起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然而城市中心论随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逐步显示出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成为阻碍中国革命向前推进的绊脚石。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重大挫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沉闷的中国大地,迫切地需求一种能拯救广大劳苦民众,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这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风吹到中国,以其先进的科学性,革命性迅速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并孕育出伟大的果实——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参考文献]

[1]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二年第11期1903年2月15日

[2]孙中山《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总理全书》之七

[3][4]《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9卷1号

[5]《我们要怎样干革命》,载《共产党》第5号

[6]参见《伟[作者简介]

曹金举,河南省上蔡县人.出生于1980年8月.学历:硕士研究生.《大的开端》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